

# 不一样的乡土 不一样的文学

□汪政

前些时陪一位作家到常州调研采风,他想表现一下现在的乡村振兴给苏南农村带来的新的变化。一路上我们围绕这个话题聊了很多。不管是哪种提法,农村的现代化、农村建设与乡村振兴都是中国农村的历史性与现实性的话题,也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我们说到了中国乡村建设的一些先行者,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以及他们的实践和遗产,也说了欧美、东亚的一些范例和经验。在江南这块土地上,费孝通曾经做过广泛而深入的调研,他的许多学术观点依然是我们现在进行农村建设的重要参考。

由此,我们说到了这一主题在文学上的表现。其实说到底,中国真正的乡土文学是从五四开始的,因此,它的总体氛围与话语模式是现代性的,是在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大的历史语境中的。于是,它的大主题和总的关注点就是农村如何进步。不管因为时代与社会的原因,这一大的主题是如何分解、变异与具体化的;不管对农村进步与现代性如何理解,对阻碍进步的原因有怎样的判断;不管这进步的方向又在何方,具体内涵又是什么,中国的乡土文学传统传达出的精神就是对农村现代化的思考与探索。

在常州,不能不提到高晓声,这是一个在中国现当代乡土文学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作家。用现在的话说,他的重要成就就是在那个时代大胆地写出了中国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且,他笔下的中国农民是有地域性格的,陈奂生、李顺大好像只能生活在江南这片土地上。我们由此就说到改革开放以来作为中国农村发展的成功经验之一的苏南乡镇企业。村村办工厂,那是怎样的一个热气腾腾的景象,现在这一景象已经不复存在,但是,正是当年的乡镇企业为苏南的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现在的苏南农村,已经完成或正在完成经济转型,我们在调研中发现,有的古镇依托传统文化发展,有的利用地方资源开发特色产业,有的正在打造新型的文旅融合的乡村旅游,有的引入高新技术快速进入现代制造,有的则通过合作成为世界的智慧板块,流连在这块土地,不断让人们惊喜。虽然面貌已变,但苏南人的精神没有变,想到当年凤章、杨

守松笔下有关张家港、昆山的报告文学,他们对这片土地和人们的精神气质确实有准确的把握。苏南在变,苏南又没有变,陈奂生、李顺大们都还在,他们的小目标变了,他们的心变大了,他们说话做事的风格也变了,但他们的心没有变,而且越来越聪明。我在与常州的农民和乡镇工作者交流时就说,你们苏南人就在“折腾”,在动脑子,你们一直在做高晓声的梦,苏南总会有一代代的陈奂生和李顺大。

高晓声的乡土文学是苏南的,陈奂生、李顺大是苏南的。由此,我想到,中国的乡土文学也不可能是一个模式,一种风格。说起来,乡土文学是写乡土,写农村,但乡土与乡土不一样,农村与农村也不一样。从文明的发生说,自然是最终的决定因素。因为它决定了这里的人们只能以这种而不是那种方式获取生产与生活资料,而且只能是这样的资料而不是那样的资料,在此基础上才可以讨论更广泛的其他问题。中国农村东、西、南、北的气候、自然地理、民族等都不一样,生产与生活方式也不一样,这些不同的环境决定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也就决定了以它们为表现对象的文学的差异。高晓声与陈忠实不一样,迟子建与范小青、王安忆也不一样。比如范小青的长篇小说《百日阳光》,如果与同时期以北方农村为题材的作品比较,它好像不够农村,不够乡土。但是,放在苏南,它又是那个时代典型的乡土文学。那时,乡镇企业已经开始转型,农村的城镇化也已经开启,苏南农村正在经历巨大的阵痛,矛盾丛生,可以说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再说到浙江作家哲贵的《猛虎图》,可以说是几十年后对温州模式的一次再写作,又是对当下互联网时代新经济生活的鲜活表现。小说以小城镇为背景,写出一群年轻人创业、闯荡的故事。既有历史感,又有现实性。哲贵写出了温州人的性格,写出了温商的性格,他们是商界的猛虎,但

这猛虎在他们的内心,他们有着南方人办事的风格和腔调,只是在他们的内心,有着经商的敏锐,有着出手的果断,有着决断杀伐的力量,哪怕一切都在秀气的江南,在温润的水乡与领带裙袂、灯红酒绿、口吐莲花之间。

现在的江南,已经找不到传统意义上的农村了。何况,在交通便利、人口稠密的平原丘陵地带,江南原本的村落与小城镇的区别就是模糊的。因此,从空间上说,以江南及江南沿海农村为表现对象的乡土文学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小城镇文学。这样的传统可以一直上溯到鲁迅、茅盾的乡土小说。这种文学空间是对江南乡村政治、文化地理与宗族世系的典型概括。小城镇是乡村关系的结点,是乡村经济的集中地,也是乡村通往远方的跳板,更是乡村自治的中心。江南作家正是通过这样的小镇建立了自己的文学邮票。仅以江苏作家而言,毕飞宇、鲁敏、罗望子、余一鸣、刘仁前等作家都曾先后经营过自己的乡村小镇。鲁敏就是通过“东坝系列”为读者所瞩目。在这个苏中平原的小镇上,人们一方面在土地上耕作,一方面从事着手工业的经营。传统的伦理规范着他们的生活,而社会的新风潮又在不断打开它,改造它。小城镇有小城镇的风土人情,有自己的风物与习性,更有自己的小传统。鲁敏的细微之处在于对这幽微的小传统的慢慢道来,如同手持一把洛阳铲,一层层地剥离岁月的土壤,见出了文化的积淀和年轮。说到这个话题,不得不说到王安忆。她好像一般不在人们关注乡土文学的视野中,而宁愿将自己作为城市文学特别是上海书写的作家。其实,王安忆创作过大量乡土小说,不上说上世纪的,本世纪就贡献过《上种红菱下种藕》《天香》这类作品。《天香》可以归入乡土文学吗?《天香》是写上海的,但《天香》中的上海不是现在的上海。王安忆是从明代落笔的,她要写出上海的

成长。那时的上海“大约就和周庄、木渎、柯桥差不多,水网密布,沿河设市”。它就是个小镇,与周围的农村紧密相连,这是典型的江南格局。在《天香》中,王安忆写到江南的农业特别是手工业,写到了江南的村镇经济,她就是试图通过一个小镇市场的成长来解开一个城市的前世今生,解开一个城市如何从小城镇走向大都市的秘密,而这样的道路不正在当下中国的城乡呈现着吗?《天香》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作家对风物与器物的描写。这也是一把解开中国乡土小说宝盒的钥匙,其实真可以做这方面的研究,从居住、农具、工具、家具、穿着,直到器皿、装饰……不同的物的描写对应着的是不同的自然与生产、生活方式。在《天香》中,它们是园林建筑、纺织、木、石、各色精巧的器物、美物、刺绣、书画……以及围绕它们的日常劳作、起居生活与精神氛围和乡规民俗。当然,最重要的是语言,只凭这个,便可以一眼辨别出东部与西部,南方与北方。

一方面,我们可以沿着新文学的发展溯流而上,寻找中国乡土文学中农村现代化的道路,寻觅中国农民的精神图谱,感受他们对美好生活的理想设计;另一方面,又要在审美多样性上品味中国作家对中国乡村文化的个性化表达,思考他们在中国三农问题上的历史性探索,更要在现实中国的道路自信中深化乡土文学的发展。事实上,是否自觉地认识到当下及未来的中国乡村振兴之路,对作家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以江南沿海而言,沿海建设、海上丝绸之路、长三角一体化,以及长江文化、江南文化和运河文化等一系列规划与理念的提出对塑造这一带的农村以及它们在乡村振兴上的意义就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也是我们在传统乡土文学多样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创造具有地域特点而又符合时代精神的新的乡土文学的立足点。

# 每一道岭都有一段历史

□葛水平

早年间过沁水和高平县搭界的老马岭,总觉得周遭的天色会突然变暗,绵延在眼目之内的青峻,森林覆在它之上。有时候一只鸟飞翔,我能感觉它的眼神都露出了忧郁。

贫穷的日子让老马岭上出没强人。在山头上过着一种非秩序化的生活,月黑风高之夜,当过路人不能隐遁自己的行踪时,他们的出现比人们的想象来得神速。

老马岭开道不知何年,战国末年秦赵长平之战,秦国军队便是越过老马岭而走进长平。长平之战的遗址,便在老马岭、浩山、董峰山之麓,至今有些名字依然冤气十足:省冤谷、骷髅山、白起台等。老马岭下的高平县至今吃一种水煮豆腐,菜名叫:“白起豆腐”。说是吃秦国刽子手白起的脑髓。一县人吃了千百年。无奈让他们默认了苦难,同时借用一道菜否定了仇恨。老马岭之南五里有空仓山。雍正《泽州府志》记秦赵长平之战前夕,秦将白起运米置仓于此山,引诱赵将赵括抢仓,括中计而败。小道消息的猖獗古已有之,一般人谁能洞见其中奥妙?这世界,小道消息也有自己的道场。

唐高祖武德八年(625),泽州治于老马岭下端氏,成为一个州府,端氏由此上升为泽州五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泽州由高平县进入端氏的往来客商,必取道老马岭。所以,老马岭同时又是上党地区通往河东的必经之路。因为山高所以林密,因为林密所以僻静,更主要的它是一条商道,强人为利而来。在沁河两岸众多的名胜景观中老马岭的诗文最少,只有元朝初年,金元文冠秀容(今山西忻州)元好问进入沁水时,为它写了一首《马岭》:

仙人台高鹤飞度,锦绣堂倾去无路。  
人言马岭差可行,此似黄榆担担步。  
石门木落风飕飕,仆夫衣单往南州。  
皋落东南三百里,鬻毛裘袄两年秋。

元好问被誉为金元文冠,在文学史上他的盛名了得。当年,他写老马岭时的心态一点也不恐慌,不过似乎也告诉了我们,元朝之前,老马岭上还没有强人。老马岭上的强人,是明代万历年后才出现的。

明万历预告了后来明的覆亡。当一个国家覆亡的时候,最早的信息总是来自民间。泽州知府河南人贺圣瑞《空仓岭城堡记》称,当局在空仓岭建有城堡用以防御:“高平、沁水界有岭空仓,势迫两山之间,中通一线之路。盗贼之渊藪,商旅之陷阱也。取货如寄,积骨如丘,咫尺之地,不复有王法。谁司之牧,令民困虐至此,能逃其罪耶!余乃会两县,相地度形,请之当道,议设城堡,为安旅之计。”历朝历代最清楚不过的是它的当政者,当一个国家出现强人并且目无王法时,一个王朝临终时的败相就露出来了。

老马岭承载了明王朝的败相。当年顺水而来的强人大多是陕西农民,沁河两岸是他们生活的开始。强人来时天不长眼。沁河中上游地处高寒地区,有40里寒冰之地,见苗可望三分收成,一般自然灾害,不会给沁河两岸带来太大的损失。然而在历史上,常常发生一些非常之灾,而且灾难发生时总是



人患相继,使两岸百姓看不到微弱的光焰。明代万历年间,沁河两岸遭受了一次空前蝗灾。蝗灾让杂生的大地一片空茫。灾不单行,雪上加霜,官府赋税不减,明末蝗灾之后陕西农民军依水而来。

河流的繁华在它的中游地段开始彰显。沁河的中游地段阳城、晋城、沁水,两岸的古村沿河而建,彼此有攀比显富的风气。强人们走来时,富裕叫他们惶惑了,四围杨柳葱茏河道,汹涌而来,寂静的阳光和农田,它不同于长安的气味,它古典优雅,夕阳下两岸的气势让他们看到了热闹和奢侈。对于陕西乡下黄土原上来的来客,贫穷落后潦倒,除了长安城,他们什么时候看到过这般富贵?这样的日子真叫人不知天高地厚,亦不知今夕何夕。造访者难活了,绝望之下为自己长期生活的破陋烦躁而羞愧。难活的人骨子里都有攻陷占领别人的欲望。天有多么不公?绝望之下的快意如潮水般涌来,他们对沁河两岸的破坏是毁灭性的。

从一开始城堡里的人就决定对抗,面对滚滚而来的黄尘,城堡在扎下根基时就已经埋下了抵御的种子。沁河岸边的湘峪、窑庄,中道庄等,不同程度都修建有大大小小的河山楼,以中道庄的河山楼为例,它是城堡中最高的建筑,有“河山为围”之意,又名“风月楼”,登楼四望,风月尽收。中道庄陈家的山河楼楼平面呈长方形,长15米,宽10米,高23米,共7层(含地下一层)。崇祯年沁河岸边竖起7层高楼,它的修建对安抚乡民占据了很大比重。楼外墙整齐划一内部则逐层递减,整个河山楼只在南向辟一拱门,门设两道,为防火攻,外门为石门,后门施以杠柱。楼层间构筑棚板屯贮人员物资。作为一座民用军事防御堡垒,河山楼的设计是智慧的。楼三层以上才设有窗户,进入堡垒的石门高悬于二层之上,通过吊桥与地面相通。楼顶建有垛口和瞭楼,便于瞭望敌情守护城堡,底层深入地窖,便于有秘密地道,便于转移逃生。同时备有水井、碾、磨等生活设施,以应付可能出现的长期围困。

依靠河山楼的庇佑而逃过兵灾活下来的村民多达近万人。因久攻不下河山楼,他们甚至想在沁河岸边归顺朝廷,想借以归顺依附朝

廷政权力量,在此守着这一块肥沃的土地享受一世的富贵荣华。

想象中的结果还没有到来时,将领们就在横生出的争功面前,因分配不均致使归降失败。一路前行,对沁河两岸的繁华依依不舍,崇祯六年(1633),陕西农民军至河北武安,依然念念不忘,决定向朝廷乞降,依旧不能统一,在朝廷犹豫下彻底放弃。农民军势力越来越大,终于在崇祯十七年(1644)年,推翻了不愿招降农民军的朱明王朝。如果当时明军能够统一指挥,陕西农民军可能会在沁水接受招安,中国的历史可能会是另一番情形,可见农民和土地依存的重要性。

强人出世,天下便有英雄要诞生了。英雄莫问出处。明王朝的灭亡诞生了农民英雄李自成。强人的出现成为天下和平的障碍,当强人转换成英雄的面目时,强人的强悍就演变成了强权社会的基本秩序。

很多人一提起老马岭上的强人,就会想起《水浒传》中冒充李逵的李鬼,黑脸黑胡,黑衣黑靴,彪形大汉,手提一双黑斧,趁着天高风紧,夜黑杀人。其实20世纪90年代老马岭上有一个强人。强人骑嘉陵车往返山巅,车藏树丛中,见有人走来,他总是很神速地出现在对方面前,一把菜刀划一个弧度,走路的人只看到强人脸上一脸黑,还挂着一副墨镜。强人不像古人一样见来人会说: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他只说一句话:留财过命!

许多被抢劫过的人从来没有有人敢认真看对方的脸。有一日黄昏来临之时,强人出现在三位过路人面前,黄昏很容易叫人眼乱,强人只喝了一声:留财过命!三人中的一人走上前说:“今日我就命死你手!”强人停顿片刻手起刀落,尖叫一声骨软落泥,后两人夺命奔跑而去。落地之人说:“爸,你吭啥气哩,我就是想一辈子能娶上媳妇盖个房。”爸说:“原来你每天外出打工,工作是打家劫舍的营生啊?”这父子二人是我本家叔父和叔伯哥哥,黄土崖下,掘洞而居的村子,隔着山梁喊话、放羊、种地,跨过山,爬过坎,娶回婆姨生一推娃,这就是他们祖辈的幸福生活,贫穷让他们为自己的幸福梦想铤而走险。

现在因为沁河古堡对外宣传大,来沁河流域旅游的人多,叔伯哥哥开饭店已经脱贫,模样也变得和大老板似的,挺胸凸肚,年老的叔父脸上曾经褐黄色的肤色也泛出了金色的温暖。“穷绊倒了双脚,总得爬起来。现在的政策好哇,我都想把饭店开到老马岭上。”叔伯哥哥说。

没有比农民更知道用劳动换得感恩了。土地离我们饥肠辘辘的生命最近,离我们对田野的热爱最近,干旱的土地给了他们成长,任凭风吹日晒,这是他们今生拥有的日子,他们懂得好,他们的好里有刻骨铭心的苦难岁月。我以沁河为背景写下了一部行走散文《河水带走两岸》,以写作为媒,传达个人经验。个人经验千差万别,我的人情物理发生在乡村,乡村的人和事和物,可以纵观历史,因此,对于故乡的人事,我是不敢敷衍的。

乡土中国,既包含对中国农村的社会学审视,也意味着文学想象中的中国乡村,两者或在细节上可彼此印证,或可在视角上相互补充。《梦醒子》(美沈艾妮著,赵妍杰译)的性质介于传记与社会学著作之间。借助对山西绅士刘大鹏日记的整理与重述,搭建起一个自清末至抗战结束前夕华北农村生活的叙事框架,展示了现代化进程中北方农村士绅阶层的精神危机与生活嬗变。面对近现代中国乡村接踵而至的变化,传主刘大鹏虽不能积极参与,但也不墨守成规。《梦醒子》的书末,刘大鹏已由乡村精英变为一个地道的老农。在他身上,我们也可看到传统乡土四民社会的解体与秩序的衰微;甚至也可看到《活着》中福贵的些许影子。要了解传统中国乡村的秩序,绕不开的一本书是《乡土中国》(费孝通著)。费老在这部出版于1947年的社会学著作中提出了中国乡村的“差序格局”,血缘与地缘等人际因素对农村社会造成的诸种影响,都被此书纳入考察范围。书中以“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比喻中国乡土的人际关系与利益网络,直到今天仍在某种意义上适用于已城市化百年的中国。比学者们谨严的观察视角更加暧昧的是,“乡土文学”这个五四以后兴起的、写实与浪漫并存的模糊概念。“可以称为牧歌型”(夏志清语)的《边城》(沈从文著)是这一文学序列中的杰作,小说提供了作者自称的“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至于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与鲁迅领军的乡土文学汲汲于对传统中国的批判、揭露不同,《边城》与其所代表的陀论、废名、汪曾祺等作家的创作,为我们提供了诗意又真切的中国乡村形象。

经历过1949年、1976年等时间节点后的中国,其乡村社会已发生根本性巨变。要了解这些巨变,我们仍可求助于文学。《山乡巨变·上卷》(周立波著)体现出作家对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的中国农村富于个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 文字中的中国乡村形象

□张德强

人化色彩的观察与表达,在普遍关心大时代话题的文学环境中,这种农村书写也许更能保留社会变动中的乡土细节与人性色彩。经历了80年代“寻根文学”对传统中国生活的再次反思,旧中国的乡土也又一次成为文学书写的热点。《活着》(余华著)的问世大有横空出世的味道,作者故意模糊了故事发生的具体地点,伴随着主人公福贵的命运起伏,如王安忆所说,这部小说展示了“人的生存之外的东西一层层地剥落”;而在这剥落的过程中,却将大历史进程对乡土中国的点滴影响化入其中。《白鹿原》(陈忠实著)是与《活着》的时空背景类似,而格局和野心都更大的作品。作者陈忠实不客气地批评:“‘寻根文学’的走向是越‘寻’越远,‘寻’到深山老林荒野野人那里去了”。在以小说对乡土中国文化心理结构的探索上,陈忠实更像个严谨的编年史作者。小说中讲述的白鹿原历经半个世纪惊心动魄的故事里,我们看到传统乡村差序格局的影子。“白嘉轩就是白鹿原。一个人撑着一道原”,我们也由白嘉轩的命运窥见旧式乡村的解体与重生。这种跨越数十年的“长河小说”式的农村书写,近30年后又在《有生》(胡学文著)中以更加丰富的视角出现了。《有生》比《白鹿原》多出近一倍的篇幅,用放射性的“伞状结构”,使得昔日与当下村庄的各类人物都获得表达的声音。乡村的价值观念、道德生活与社会结构,既在发生着改变,又仿佛有着回归。

但是,毕竟是改变多于回归,有些东西一去不返,乡村在社会生活的位置日益边缘化。《出梁庄记》(梁鸿著)以非虚构写作的文体身份出现在人们眼前时,的确让人眼前一亮。“非虚构”意味着纪实多于感怀,《出梁庄记》将当下农村的生活境况真实展示于读者面前。乡村成为高速城市化的中国的偏僻角落,农民工们日子是华丽世界的另一面。作者以严肃的人文情怀和社会学眼光,唤起人们对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迅速边缘化的乡村的关注。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